

【明】

袁宗道 袁宏道 袁中道 著

三袁 随 笔



四川文艺出版社



【明】袁宗道 袁宏道 袁中道 著

三袁随笔

江同渔校点 冯川序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三袁随笔

(明)袁宗道 袁宏道 袁中道 著

江问渔 校点 冯川 序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吴 鸿

封面设计：邹小工 刘 民

版面设计：吴 优

书 名 三袁随笔

定价：20.00 元

作者：(明) 袁宗道 袁宏道 袁中道 著

ISBN7-5411-1627-0/I·1454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5.75

字数 39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成都宏明印刷厂印刷

序 言

冯 川

公安三袁是明代杰出的散文作家。三十年代，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刘大杰在重印袁中郎全集时，称三袁的文章在明代造成了一场“新文学运动”。这场“运动”在晚明的影响的确非同小可，人们只要知道那时有人拿三袁比三苏，说中郎是坡翁转世，小修是子由后身，就不难想见当时的情形。因为当时的文坛，摹拟复古的风气已经到了矫揉造作、毫无真实个性的地步，三袁的出现，便宛如一阵春风，在荡涤衰朽的同时给文坛带来了真实、清新的气息。

三袁之中，无疑以中郎的成就为最高、影响为最大。明清之际著名文学评论家钱牧斋曾说：“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李贽），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天下之文人才士（至此）始知疏濬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确实，中郎之为文，一如小修所说，其意乃在破人之沉溺与束缚，“故时时有游戏语，盖其才高胆大，无心于世之毁誉，聊以舒其意之所欲言耳。”（《游居柿录》）这样，自然也就能不拘一格、别具目睹地状写山容水态、人情物理，正所谓为宇宙拓多少心胸，辟多少乾坤，开多少眼目，点缀多少烟波。而其胸中的一段逸趣精光，便也自然而然地突跃纸上，令人读后连声叫绝，恍然若睹其平生潇洒出尘、俊逸不群之风貌。

不过若以为三袁之中惟中郎特为俊逸，伯修、小修之文皆不足

观，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从文学史角度看，三袁兄弟共为新变、拯世救溺、独开风气的创举，本身就表明他们都具有非同寻常的胆力、才力、学力和识力。钱牧斋称伯修“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宏道称小修诗文“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金，如水东注，令人夺魄”；都不是一时吹捧的浮泛之语。当然，无论性情还是文字，三袁兄弟都各有各的风格与个性，彼此不容混淆与取代。但另一方面，他们彼此的文章，却又正如水中月、镜中花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至无形中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当时和后来的文人中，三袁兄弟确实是最能洞烛对方、了知对方、反映对方、毫不囿于自我地聆听对方和观照对方的。今天看来，三兄弟之间的倾心推崇，除了是各自性灵的自然流露外，也是对对方人品与才华、文情与逸趣的最不可多得的传神与写照。

三袁在各自文章中追求的境界，是一种有真性情、具真面目的境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文章必须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这无疑是他们发自生存需要的主张，但在极大程度上却共鸣着同时代大思想家李贽的思想。李贽指斥当时的文坛已虚伪到了扼杀个性和“满场皆假”的地步，在他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的说法中，主张以性情文章护持真实个我之意向，被提到了文人的自我拯救这一生死存亡的高度。《童心说》云：“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真人既失，那依然活在世上的，便不知是言不由衷的乡愿腐儒，还是徒具躯壳的行尸走肉。——“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皆假，矮人何辩也？”——这真是以惊世骇俗之

语，给人以一记末世论的当头棒喝。

袁中道(小修)曾多次言及袁氏兄弟从李贽那里受到的影响。——“先生(中郎)既见龙湖(李贽)，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胸中)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中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以这种吞吐万象、新人耳目的气势，三袁兄弟率先在当时的文坛上，向日益虚伪与腐朽的官方意识形态发起了强劲的攻击。

不过，这一不妨称为“狂飙突进”的攻击，却采取了较李贽为隐蔽的方式，以至表面上看，它仅仅表现为文坛上反对虚假摹拟的抗争。然而，反对虚假摹拟的文风，其实质却是要通过使文学重新成为诗人独特生命之言说，来唤醒那由于“失语”而变得虽生犹死的个我之真性。摹拟的写作把文学变成了没有真情、没有灵性的技术性、习惯性操作，从事这操作的文人因而得以逃避痛苦的人生及其“完整而可怕的自由”(即既可以作为合群的肉体而活着，也可以作为属灵的生命而生存；既可以随波逐流于社会历史之必然，也可以幡然醒悟于真实个我之偶在)。换句话说，机械的摹拟作为文学的大敌，其险恶的用心就是要用早已群体化、早已被定型的文章格式来使蒙难的心灵陷入失语后的麻痹。在这一意义上，三袁开创的新文风，其真正的意义乃在于通过与日益反文学的文学对抗，重新赋予已经蒙难死去的文学以生命，并以此触动和唤醒沉沦已久的真实性灵，使之从各种各样的障蔽中获得拯救。

三袁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物质享乐之风盛行的时代，那时大大小小的官吏都在自己的任上肥肥地捞了一把，于是便竞相攀比地炫耀起奢侈淫靡的享乐来。《明史》卷三〇八记严嵩之子严世藩倚仗父亲的权势在京中大修府邸，“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

中，日拥宾客纵娼乐……居母丧亦然”，“日纵淫乐于其家。”后坐法被贬，“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园亭。”到最后以谋反嫌疑被杀时，“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它各种珍宝古玩“所值又数百万”。当时另一权奸鄢懋卿也是如此，史称其“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厠床，白金饰溺器。……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采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这种奢靡的风气，就连“一代名相”张居正也不能独免。史载张居正回乡葬父时，“真定守钱普创为坐舆，前舆后室，旁有两庑，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过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官员们的豪富，竟连皇帝也看得眼红。史载张居正死后，明神宗心羨张居正家财，下令抄没其财产。“所遣使者将至，荆州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明史》卷二一三）有人指出，袁宏道十七岁那年写的长诗《古荆篇》，就是有感于这件事而作的。（陈子龙《明诗选》：“此篇似刺江陵而作。”）的确，诗中“霍氏功名成梦寐，梁王台馆空山丘……汉恩何浅天何薄，百年冠带坐萧索，昔时嘘气成烟云，今朝失势委泥砾”等句，很可能暗含着对张居正和明神宗的讥刺。以张居正生前权势之煊赫，死后也不过落得如此下场，在这个世事如浮云过眼的世界上，还有没有可以执著不舍的事业呢？——难道人生在世的惟一安慰就是竞相炫耀奢侈淫靡的享乐吗？

以三袁兄弟的夙慧、超迈与通脱，当然绝不会把尽享荣华富贵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而去过那种朝生暮死的无聊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方面不能完全断绝于“名根”，另一方面却总是汲汲于“悟道”和“立言”，以便使自己从那种虽生犹死的生活解脱出来的缘故。

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三袁兄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用宏道的话说，这是一个“豪杰不乐为用”的时代。其《顾升伯太史别叙》云：“古今豪杰，未有忘情功名者。惟当不可用之时而求用，与值可以用

之时而不能用，其无才等也。夫士当其可用，则为龙为蛇，为锋为颖。当其不可用，则陆沉众中，宁晦勿耀，宁与庸夫同其庸，不与智士同其杰。然可用不可用，其几甚微，非至圣大贤，不能测识。天下方倒悬危迫，家操戈而人盗贼，此其时不可用矣，而豪杰之士曰：‘可用！’投身刀戟之林，濒死不悔，不尽其用不止者，张子房、荀文若、贾诩之流是也。天下方治且安，庸夫高枕，循资格而据上位，此其时可用矣，而豪杰之士曰：‘不可用！’捐弃世乐，栖身荒寂，视名位若桎梏，去冠裳若涂炭者，梅福、梁鸿、司空图之属是也。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杰不乐为用……时事至此，尚安忍复言。”——生当这样的时代，三袁兄弟虽然也先后几此出仕，做过这样那样的官，但骨子里却始终不能忘情于江湖与山林。正因为如此，中郎才几次辞去地方和中央的官职，而伯修虽然身居东宫讲官那样的高位，死前却早已经做好了归隐的打算。

当然，三袁的性格是极其矛盾的，这一点在小修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中郎《叙小修诗》称小修“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故）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常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撙节，故常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真是活画出了他那天生的文人性格。但另一方面，把功名利禄看得很轻很淡的小修，却又总是不能断念于举业，以致经过二十多年的场屋之苦，到四十六岁那年，好不容易地中了进士。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做“叨得一第，聊了世法；”（《与愚庵》）或：“举业是人生一厄，过了此关，正好理会性命。”（《答陶不退》）我私下以为，小修的不能断念于科举，更多是出于想要证明自己并不输于一时之辈的自慰，而并非真把走上仕途视为一种荣耀。对于官场的戕灭性灵，三袁兄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中郎辞去吴县县令时，有“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与聂化南》）之语。对此，态度不如中郎那么决绝

的小修，当然不会是没有同感的。小修性情随和、与人为善，其答为宦之友人书曰：弟以为“与其舍尘劳而求净业，不若即尘劳而为净业。如仁兄作官清廉，不掊民财，此非净业乎？”（《答陈布政志囊》）又曰：“诸公有谓作官妨道者，弟谓既已见宰官身，不必更学沙门事，但此心与天下痛痒实实相关，随其所居之位，留心济人利物，即是大功德，即是菩萨行也。”（《寄同学》）但到了自己也终于做官的时候，则曰：“大端我辈毕竟是一肚不合时宜，……即不能效鸟飞鱼沉，为长往之计，而庶几处非仕非隐间，聊以藏身而玩世，四五年间，得列郎署，山资稍足，便脱身归矣。”（《答钱受之》）又曰：“看来世间自有一种世外之骨，毕竟与世间应酬不来。弟才入仕途，已觉不堪。荣途无涯，年寿有限，弟自谓了却头巾债，足矣，足矣。”（《与梅长公》）——可见他到底是文人性情，与那些把文章学问当作跻身官场的敲门砖之辈，正不可同日而语。

三袁的淡泊于仕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都把短暂的生命看得极其认真，因而于个人的进退出处、生法死法，都力求作一番透彻的思考。这就使他们把“学道”和“悟道”，看得比荣华富贵更为重要，而对于一己之个性与灵明，遂有一种特别的珍重和爱惜。

小修为伯修作传，称伯修“二十举于乡，……逾年，抱奇病几死，有道人教以数息静坐之法有效，始闭门鼻观，弃去文字障，遍阅养生家言”，以至“栽花薙药，不问世事。”后在父亲逼迫下赴京应试进士考，几死于途，又“幡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几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石浦先生传》）及其为官京师，与焦弱候、僧深有相与问学，益有所获。自此而往，由道入佛，援佛入儒，研精性命，屡疑屡悟，其精进之心未尝一日而稍懈，故虽身居高位而两袖清风。——“卒于官，棺木皆门生敛金成之；检囊中，仅得数金，及妻孥归，不能具装，乃尽卖平生书画几砚之类，始得归。归尚无宅可居，其清如此。”古希腊哲人曰：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一过。由是观之，则伯修

之生，正所谓“不要万贯家财也要弄清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而伯修之死，则应了“朝闻道，夕死可焉”那句圣言。——伯修《杂说》曰：

宋时有一老人，置酒大会。酒阑，语众曰：“老人即今且去。”摄衣正坐，奄奄欲逝。诸子惶惧呼号，乞留一言。老人曰：“我何言？第一，五更起。”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干自家事。”诸子曰：“家中幸丰，何用早起？举家诸事，皆是自家事，岂有分别？”老人曰：“所谓自家事，是死时将得去者。”罗近溪语人曰：“某幼时，与族兄访一亲长。此老颇饶富，凡事如意，时疾已亟，数对某兄弟叹气。归途，谓族兄：‘此翁无不如意事，而数数叹气何也？兄试谓我仕宦至为宰相，临终时有气叹否？’族兄曰：‘诚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须寻不叹气事为之。’夫不叹气事，即是临终将得去者。我辈壮年，便当干办，不宜更待衰老也。”

此正所谓死亡纯属个人自己的事，无人可以替代，也无物可以救赎也。对此，中郎之《兰亭记》说得更为的当：

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故或登高临水，悲陵谷之不长；花晨月夕，嗟露电之易逝。虽当快心适志之时，常若有一段隐忧埋伏胸中，世间功名富贵举不足以消其牢骚不平之气。于是卑者或纵情麴蘖，极意声伎；高者或托为文章声歌以求不朽，或究心仙佛与夫飞升坐化之术。其术不同，其贪生畏死之心一也。独庸夫俗子，耽心势利，不信眼前有死。而一种腐儒，为道理所锢，亦云：‘死即死耳，何畏之有！’此其人皆庸下之极，无足言

者。夫蒙庄达士，寄喻于藏山；尼父圣人，兴叹于逝水。死如不可畏，圣贤亦何贵于闻道哉？

像这样一语勘破的至论，大约也惟有从中郎口中方能道出。大抵中郎之卓尔不群，正在于他不愿以一般人的方式来反抗死亡或淡忘死亡。由此一路，便走入对一己之独特性灵的钟爱，进一步发而为个性之张扬与文章之踔厉。小修为中郎之《解脱集》作序，称中郎少时因感于死生之可怖，而“刻意艺文”以求乎不朽，点出了中郎私心的一段隐忧；又尝论中郎不同于伯修之处曰：“当是时，伯修与先生（中郎），虽于千古不传之秘，符同水乳，而于应世之迹，微有不同。伯修则谓居人间，当敛其锋锷，与世抑扬，万石周慎，为安亲保身之道。而先生则谓凤凰不与凡鸟共巢，麒麟不共凡马伏枥，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可见，同样是有感于死生之可怖，中郎却对自己的一生，作出了完全不同于伯修的安排，这正是兄弟二人各有其率真性格的表现。

关于中郎的超世脱俗，本来有许多话可以说，但我以为最值得一说的，却是他任吏部主事时怒斩猾吏的非常之举。

当时官场的腐败，从吏部的卖官鬻爵最可见一斑。中郎任吏部主事时，主持吏部的杨时乔以年老多病，其下属徇情纳贿习以为常，选授官吏几乎全凭门路关系。当是时，大权旁落，胥吏主政，积弊既久，殊难革除。独中郎怀疾恶如仇之心，抱一不做二不休之念，决当为官一日，便厉行整肃一日，誓不容此辈得逞于一时。故尝借探病之机，向杨时乔言及吏部之积弊，表示愿为国家除此大蠹。杨公叹息曰：“吾辈身为大臣，受制胥吏，切齿久矣。但此辈内结中官，外恃姻党，设有不测，为累不浅。”语重而心长，大有无可如何之慨。以中郎之明达，自然不会不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要之，此辈虽为僚属，但经营既久，其卖官鬻爵徇私舞弊结成的关系网络也不容低

估。无奈胸中正气终有不可吞咽，必欲一吐为快者。会一日选官，手下一吏竟公然“排闥而入”，自称“每次大选，例与都吏一二美缺，今有某驿缺已予都吏百金矣，幸以见与。”其无法无天恣意妄为，竟到了如此明目张胆的地步。后又私庇一姻戚，“已罢官，而仍留之。”中郎闻之，力主严惩。有犹豫者拟先上报，然后逮而治之。中郎独曰：“此胥吏也，但置之于法，以一知会疏上，则迅雷不及掩耳，虽有奥援，将安用之！”遂如言措办，而猾吏未知也，入署，傲然自如。中郎令两隶持之，曰：“去！送汝入刑部，汝不得活矣！”猾吏错愕，不知所为。已而疏下，竟以欺罔坐重辟。自此，属吏稍有收敛。——而中郎则以大厦将倾一木难支而撒手辞官去也。

从万历二十年举进士到万历三十八年去世，十九年间，中郎一共做了三次官，每次都是一年两年，很快便撒手而去。三次加起来，总共也只有五年左右的时间。然去就之间，却颇能见其心计。某种意义上，中郎鲜明的个性，正是在其辞官与为官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故小修为之作传，有“识见爽豁，机用圆妙……识如王文成（王守仁），胆如张江陵（张居正），假之以年，天下事终将赖之”之语。

——不过，平心而论，中郎终究是一介书生，他那率性而为、特立独行、誓不与流俗为伍的个性，以及他刻意选择的生法与死法，都决定了他不可能长久地跻身于官场。这一点，中郎本人必定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

关于三袁散文的成就，前人之论多矣，大抵以其率意为真，故能独开一时之风气。明人贺熙龄序中郎之文集曰：“人必有特立不拔之操，举人世毁誉荣辱无一毫动于中，乃足以穷天地昭日月亘万古而不变，此立身与为文无二道也。韩文公为古文于举世不为之日，不知非笑之为非笑，遂以起八代之衰。五代之际，文质扫地殆尽，欧阳文忠公起而振之，而文学粲然复兴。是二公者，岂其有意与世俗抵牾而苟以要后世之名哉？学足以充其所见，力足以贞其所

守，而毁誉荣辱之私不得而夺之也。有明一代，作者林立，自李献吉、何仲默倡为复古之说，李于鳞、王元美嗣起，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英词壮气，凌厉无前，其弊也模拟过甚，真意渐漓，而一时靡然景仰附从，犹如斗之有杓，山之有岱也。独公安袁中郎先生不相推奉，而矫之以清新宕逸之辞，其时风气一变。虽其后亦时有胜有不胜，而先生之沉识定力，不苟随俗波靡以取悦当世，可不谓豪杰之士欤！”（《重刻梨云馆本叙》）其论颇能拨云见月，由人及文，重现中郎文章之逸气。但其所以为誉者，也适足以为非。大抵三袁文章之见誉于世，固以其率性而真，而其所以见非于时，则也以其率真而俗，而俚。高识卓见如钱牧斋，也以为中郎之文章矫枉过正，转生流弊；小修之文章则患在才多，须放笔删削。——然则三袁之文章果真为一时之俗文俚文么？

宋明以来，市民社会形成，在满足都市人读书需要方面，书商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一些过去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作品，乃至一些被认为“离经叛道”的文章书籍，便得以刊行于世，并在与所谓“名家”、“正统”的相互比较中，显示出其真正的文学价值，从而使先前大量充斥于世的流俗之作相形见绌，失去了昔日的市场。这一点，对于文学的繁荣，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此，伯修在《答陶石簪》书中已经看到，其文曰：

中郎极不满近时诸公诗，亦自有见。三四年前，太函新刻至燕肆，几成滞货。弟尝检一部付贾人换书，贾人笑曰：“不辞领去，奈其无买主何！”可见模拟文字，正如书画赝本，决难行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

在一定意义上，三袁的文章能够“大行于天下”，也恰恰是得力于读者、书商和当时文化市场的需要。关于这一点，人们只要知道他们的文集那时是如何的畅销，以至有的书商竟把不是他们的作

品也混到他们的文集之中来刊印兜售，就不难想见其情形。这样的“风行”，其一个必然的负面效应就是：三袁的文章，包括其语言与风格，开始受到众多文痞的模仿，而模仿的结果，则是被模仿者险些被模仿者葬送。这的确是“大众传媒”在“大众时代”能够给文学带来的一个最致命的伤害——真正富于原创性的作品被淹没乃至等同于毫无价值的趋同之作。

三袁的文章能够被人模仿，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太爱使用俚俗之语。这本是他们点铁成金、化俗为雅的过人之处，但却不幸而不能免于批评者之诟病。中郎称小修之文章“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文人气习故也。”可见批评者之所谓俚俗，恰是他们刻意要追求的本色境界，而这显然与他们以文为禅，以禅入诗的追求分不开。余窃谓：最高之禅境有两种：一，无可说；二，无不可说。中郎和小修走的是“无不可说”一路，故其往往开口见舌，语无忌讳，篇中也多有不伦不类之辞。令人惊异的倒不是他们的某些文章如何的不伦不类，而是时下某些研究者一方面推崇诗文之禅境，另一方面却指责他们的文章宣传了放纵享乐的思想。殊不知放纵享乐恰是当时的时代风气，而三袁相比之下却还要算有禁欲倾向的。要之，三袁的以文字为游戏，不是要为当时的纵欲风气张目，而恰是要把自己从这样的末世生活中超升拯救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的“俚俗文章”便赢得了和山水游记相同的价值。

说到三袁的山水小品，那是方家一致推崇的，用不着我在这里吹嘘推销。唯一不妨说一句的是：正因为其人颇多逸趣，才能使山容水态在其笔下脱尽了俗气。至于我特别喜欢的传记如《徐文长传》、《拙效传》、《玉莹传》、《李温陵传》等，也不妨说一句：正因为其作者颇有不羁之奇致，才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有了奕奕传神的魅力。

1996年9月23日

目 录

序言(冯川) (1)

袁宗道(伯修):

游 记 类

游西山一..... (1)

游西山二..... (1)

游西山三..... (2)

游西山四..... (3)

游西山五..... (3)

戒坛山一..... (4)

戒坛山二..... (4)

上方山一..... (5)

上方山二..... (5)

上方山三..... (5)

上方山四..... (6)

小西天一..... (7)

小西天二..... (7)

游九龙池..... (8)

显灵宫西阁..... (9)

显灵宫柏..... (9)

三圣庵纪游..... (9)

极乐寺纪游 (10)

三忠祠纪游 (10)

锦石滩 (11)

岳阳纪行 (11)

嘉鱼纪游 (12)

大别山 (12)

龙湖 (13)

江上游记 (13)

二圣寺游记 (14)

杂 著 类

论文上 (16)

论文下 (17)

论大人小人 (18)

论用才 (20)

不肖 (21)

读子瞻范增论 (21)

论留侯邨侯踪迹	(22)
论谢安矫情	(23)
读渊明传	(23)
俭约	(24)
论隐者异趣	(25)
杂说一	(25)
杂说二	(32)

袁宏道(中郎):

游记类

虎丘	(43)
上方	(44)
西洞庭	(44)
东洞庭	(45)
灵岩	(46)
阳山	(47)
阴澄湖	(47)
荷花荡	(47)
光福	(48)
天池	(48)
横山	(49)
穹窿	(50)
崖崕	(50)
楞伽	(50)
天平	(51)
锦帆泾	(51)
百花洲	(52)

姑苏台	(52)
园亭纪略	(52)
游惠山记	(53)
惠山后记	(54)
西湖一	(54)
西湖二	(55)
西湖三	(55)
西湖四	(55)
雨后游六桥记	(56)
孤山	(56)
飞来峰	(56)
灵隐	(57)
龙井	(58)
烟霞石屋	(58)
南屏	(58)
莲花洞	(59)
御教场	(59)
吴山	(60)
云栖	(60)
湖上杂叙	(60)
湘湖	(61)
禹穴	(61)
六陵	(62)
兰亭记	(62)
鉴湖	(63)
西施山	(63)
吼山	(64)
五泄一	(64)